

·序跋集· 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中国家都有大规模贫民窟,走出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

## 城市化进程中的返乡权利

城市化,简单说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融入城市,农村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从欧洲开始的现代化带来了全世界高度的城市化。目前全球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是高达80%左右。

从城市化的效果来看,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可谓又好又快,即不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即使失业也有国家提供的保障。欧美日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无论城市化率高或低,都有一个极大比例的进城人口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国家也无能力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保障,表现出来的就是触目惊心的城市贫民窟。

欧美日与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效果之所以会形成如此整齐鲜明的对比,根本的方面不是制度安排,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欧美日是老牌发达国家,国家能为进城人口提供大量高收入、有保障的就业机会,少数进城失败者,国家也有能力进行救济。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城人口无法获得可以在城市

体面安居下来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于是出现了大片的贫民窟。

这样一种只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关,而与制度和政策选择无关的城市化效果,几乎是一条铁律。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人均GDP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却在城市外观上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差异极大,而与发达国家有得一比,即所谓中国“城市像欧洲”,且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中国家都有大规模贫民窟。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

与一般国家城市化不同的道路,即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其秘密恰在于中国独特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比如当前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安排保证了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选择返乡。

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因为中国城市化为进城失败农民留下了返乡的权利。当农民进城失败,他们可以选择返乡。相对于贫民窟中毫无希望的生活,农村家乡

贺雪峰/文

不仅足以解决温饱,有吃有住,而且有熟人社会的支持网络。或者说,相对于贫民窟生活,返乡是不错的选择。正是农民可以返乡,中国城市没有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大规模贫民窟。

有人习惯于将中国城市化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其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应比较的对象是亚非拉国家,尤其是人口规模与中国接近的印度。在城市化方面,中国要比印度成功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成功,原因恰是争议很大的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并非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负担与累赘,而是制度红利。正是这些制度为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稳定器,为利益调整提供了弹性空间,为国家政策提供了优选可能。

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城市化和现代化战略,必须充分关照国情,充分利用制度红利。中国应当同时驱动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现代科技的三个轮子来推进中国现代化,也即本书所说“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此文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自序,本报有删节)

·坐看云起· 虽然引发了很大争议,但抗战时期的年度学术评奖活动还在继续

## 1942年的一次学术评奖

1942年的年度学术评奖惹出不小的争议。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42年5月13日”条下有下列纪事:报载重庆讯: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决定奖励学术著作多种,其中有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所著剧本《野玫瑰》。戏剧界同人对此颇有异议,二百余人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转函教育部撤销原案。信中说:“《野玫瑰》曲解人生哲学,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则不仅对于当前学术思想无功勋,且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相违,危害非浅。同人等就戏剧工作者之立场,本诸良心,深以此剧之得奖为耻。抗战剧运正待开展,岂容有此欠妥之措施。”

《野玫瑰》的剧情并不复杂,不过是一个国民党女特工在沦陷区锄奸的故事。也许是以“女特工”为主角增加了剧情的传奇性,也许是《野玫瑰》中的大汉奸超越了一般的概念,总之先在昆明后到重庆演出的《野玫瑰》获得了巨大成功,《野玫瑰》的主演秦怡回忆说,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些空军官兵也来看戏,但戏票已经一抢而空,军

人买不到票,竟然在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坚持要入场看戏。现在看来,这个剧本的艺术性其实不高,但左翼文化界对此剧的抨击显然意不在此,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野玫瑰》宣扬的“国家至上”理念(执政的是国民党)才是左翼文化界眼中的大敌。

《野玫瑰》有无获奖之资格?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因人而异,获得共识很难,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其实是:《野玫瑰》获奖是否经过了正当的程序,有没有人为操纵的因素?

针对左翼人士的批评声浪,国民政府官方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了回应,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称《野玫瑰》获奖完全是学术审议委员会“投票的结果”。

学术审议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于抗战时期设立的最高学术审议机关,29名委员中,除4名在教育界任职的官员外,多为著名学者,如蒋梦麟、竺可桢、茅以升、傅斯年、马寅初等。查阅竺可桢1942年的日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竺可桢全集》第8卷),4月17日记载了审议、投

黄波/文

票年度学术奖的情况,“八点至部开学术审议会。计通过奖金甲种一万元者有冯友兰之《新理学》及华罗庚二人,得乙种奖金五千元有胡肖堂、涂长望、金岳霖、杨树达、陈启天、张宗燧、许宝禄七人。尚有得三等奖二千五百元者,杜德三之《铁道瘤》,卢前《邵祖平诗集》,曹禹《北京人》等”。陈铨的《野玫瑰》获得的是三等奖,在竺可桢日记中,被一个“等”字包括了,这一细节既表示身为科学家的竺可桢对《野玫瑰》不曾特别垂注,也说明《野玫瑰》的最后获奖在当日委员中并未引起不寻常的波动。

虽然引发了很大争议,但抗战时期的年度学术评奖活动还在继续,而且这个活动也终于得到了客观的评价。当代学者在论述现代学术奖励机制之形成时肯定了抗战中设立年度学术奖的作用,并且下了一个判断:“评奖并没有以政治倾向作为依据,体现了评奖委员会非常独立的立场。后来此类奖项,也有不少左翼人士包括共产党作家的作品获奖。”

·定睛一看· 大家在拥堵的马路上都想飞起来超越别人,那么天空中又会堵作一团。道路的顺畅,是靠秩序而非捷径

## 让汽车飞起来?

经常在路上遭遇堵车,心急火燎,百爪挠心,越有急事越是寸步难移。此时,估计很多人跟我有过共同的想法:车子飞起来,直接从众人头顶越过去,落到目的地。或者像个巨人,轻轻把挡在前面的车像抓拉玩具一样统统抓拉掉,然后一路畅通地开走。

下棋的时候,眼看着对手的棋子就在面前晃来晃去,却吃不得,打不得,心里那个急啊,恨不得打破一切规则,直接用自己的“马”踩死对方的“车”。

遭遇到各种麻烦事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期待捷径,一劳永逸,瞬间解决所有的问题。捷径当然不是什么坏事,对捷径的渴望,能够促使我们产生创造力,比如设计出更合理的程序,让电脑更快更实用。但如果没有捷径呢,车只能堵在那里,是按部就班地等待,还是想方设法超越跳脱?

反思一下,其实每件麻烦事后面,都有一套完备的规则。而规则一般都是经过多次摸索实践之

后,证实为在现有条件下最方便快捷的途径。也可说规则即捷径。如今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科举制度,在当时就是最好的选拔制度,比起靠出身来选拔人才的办法(门阀制度)显然要公平许多。有了规则,旧办法就抛弃了,靠着这一步伐,社会进步了一小步。显然,有了这个规则,受益人也多了,很多疙疙瘩瘩的事儿顺畅了。

按部就班等待,就是按规则行事。是规则上道路通畅而不是想象中的捷径。因为你走捷径,别人也想走,大家在拥堵的马路上都想飞起来超越别人,那么天空中又会堵作一团。道路的顺畅,是靠秩序而非捷径。曾看到一个视频,日本发生大地震时,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但大家都一歩道上排着队按次序逃生。如果大家乱糟糟地四散乱逃,难免不发生踩踏事件。

人们都向往自由,但自由是什么?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有详尽表述,自由其实就是规则。在这个规则下,人人都要自我限制,你到美国去闯

王国华/文

红灯试试,或者在饭店里大声喧哗,在街上乱扔垃圾,在小区里用大功率音箱跳广场舞,用远光灯晃对面来车等。你如果在高速上飙车,警察会开着直升机追你。你不自我限制也没关系,总有各种严格的法律法规限制你。所谓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有些西方人到中国来,不久之后就随地吐痰,乱闯红灯。这些文明人变得不文明了,因为没有了规则,所以乱来。遵守规则的反面成了傻帽,不遵守也没什么损失,他们为什么要遵守原来的规则?

被规则限制日久,不免产生打破的冲动,但打破了旧秩序,不是就可以完全无法无天了,必须有新秩序。秩序没有了,保护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了。有一次过马路时,红灯亮了很长时间,马路上并没有汽车。一些长于中国式过马路的人,开始见缝插针地走过去。我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妈妈,牵着自己的儿子,坚决地站在那里等到绿灯,才肯起步走。我想,这样的人,人生道路就是应该比别人通畅。

孟晖/文

臆气涨、利胸膈、宽中解暑”的功效,尤其以三伏天里的“伏露”为佳,入秋之后的“秋露”过寒,不宜品饮。不过,乾隆倒是一样喜欢“秋荷叶上露”,并不觉得这种露水烹茶会有碍健康。

在明清人那里,荷叶上的晨露还会作为女性化妆时的养颜水,文人也讲究用这种清露研墨或调颜料,让墨色与颜料澄净。于是,一种收集荷露的灵巧方法也被发明出来:特备一把长柄勺,在长柄端头的勺斗上套放一只口径相对略大的瓷碗,趁天色未明之前,采露人乘着小船,深入荷塘,寻到叶面有露水积汪的碧荷,把长柄勺的勺斗小心伸出,让瓷碗的边缘触到荷叶,小心地令叶尖倾欹,就势引得荷心积露沿着叶面滑落到瓷碗中。

乾隆非常钟意于荷露烹茶的享受,曾特意下令烧制成套的瓷茶壶、盖碗及托盘、壶壁、碗壁分别以矾红录写他的两首《荷露烹茶》诗,盘底则饰以荷叶田田的纹样。今天,备受工业污染困扰的环境条件让人难以品尝荷露的清与香,保存下来的乾隆御制“荷露烹茶”茶具却记录着过去的雅味。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无限杂思·

时间制度和计时工具后面,有着对时间将无尽到来的信赖。正是这种信赖,使人们能够去规划时间,规划生命,作出各种长时间的打算。

## 洛克的时间洞见

刘洪波/文

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运动的量度。斯多葛学派认为,时间是运动的间隔。当我们感受到时间可分解切割的一面时,这些思想显示出价值。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说,“恒常的、普遍为人所观察的、而且是隔着相等的周期的,则虽没有运动,它们亦一样可给人们计算出时间来”。这是深刻的洞见,它表明时间可以用任何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去度量。

自古以来,日月星辰的周期性运动,使人们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并产生时间观念和时时间制度。太阳升降产生了“日”,月亮圆缺产生了“月”,寒暑交替产生了“年”,气候周期产生了“季”。恒星和遥远星系的闪烁,供人们识别一年何时开始,季节何时转换。公鸡打鸣使人们知道应该何时起床。时间通过自然的各种周期呈现出来,日月升降、星辰方位、公鸡打鸣、燕子归来、柳树抽芽都是可靠的钟表。需要更细密地划分时间时,人们制造了日晷、月晷、星盘。所有这些,建立在大自然的周期之上,借助于光与影的观察。

如果不是对时间的存在深有认识,如果不是对时间的到来就像对天地日月的信奉一样笃定果决,人类就不会有年、月、日、季的观念,也不会制造出日晷、星盘之类的计时工具。时间制度和计时工具后面,有着对时间将无尽到来的信赖。正是这种信赖,使人们能够去规划时间,规划生命,作出各种长时间的打算。朝不保夕的状态下,人们不可能需要任何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计划,也不可能去进行时间的计量。

从“立竿见影”的日晷、月晷,到不舍昼夜的漏刻、香钟、计时烛等,在计时史上来说,解决的是自然光影缺乏状态下的计时难题。日有阴晴明晦,月有朔望圆缺,总有时候不能“立竿见影”。漏刻等计时工具,使计时成为“全天候”活动。不受气温影响的沙漏还能克服水漏天冷结冰的不足。齿轮传动的发明,使人类拥有了钟表。

这些发明纵使并不精确,但其伟大之处在于使人类的时间感知脱离对自然周期的依赖。从依赖天地日月,到建构人工周期,这一替换显示人类对自我智能的确认。这需要将时间作为一种普遍属性,从自然界剥离出来,就像人们从每一种具体事物的数目中抽取出数量这样一种属性。时间的概念化完成了,人们确信自己了解时间的奥秘,相信人工周期能够复制出自然的节奏,而非被动接受天地日月的动力学机制。

在人工周期的初始阶段,人们是否拥有“时间是恒常的周期性呈现”的思想,也许是不无疑问的。这种高度理性的概括,直到洛克才给出。这个认识意味着即使太阳不在天上运动,而且是发出强弱不同的光,也可以用于时间的度量。它还意味着任何周期性现实都可以成为时间的工具,从而为石英频率、原子频标作为时间标准开辟了可能。但在人工周期的初始阶段,人们也许只是无意识地寻找加密时间片段的方法而已。

接着,用人工周期校正太阳、月亮等“星钟”的时代到来了。摆的原理被发现,并用于之钟表,时间计量成为物理学、力学和计算的领域。稳定、可复现的周期控制,提高了钟表的精确性,足以解决天文学家的时间困扰。太阳作为钟表是有时差的,一年四季,昼夜长度在变化,以日晷分割小时,小时的长度不一样,摆钟却能提供等长的小时。惠更斯造出第一座摆钟3年后,就提供了一份精确的时差表。地球的转动正在变慢,人工周期今天却能数十亿年不差1秒。

人工周期使今天的计时与其说是顺应自然,不如说是迁就自然,以及我们在自然钟表下形成的时间文化。自然周期不准确,才需要闰年闰秒。我们接受闰年闰秒,只是为了春天昼夜相等的那一天叫3月21日,为了12时太阳正好照在头顶而非月上柳梢,如此等等。

·凝光笺· “荷叶上露”尤其以三伏天里的“伏露”为佳,入秋之后的“秋露”过寒,不宜品饮

## 三伏荷露好烹茶

《红楼梦》中,妙玉以从梅花上收的雪烹茶招待宝黛,让现代读者又钦羨又好奇。其实,在明清人的观念里,到了夏天,尚有一款节令风味特别值得舌尖上细品,那就是荷叶上的晨露。

“荷叶上露”有个超级粉丝就是乾隆皇帝,他喜欢以诗的形式披露相关心得体会,直接以《荷露烹茶》为题的诗作就不止一首,其一是:“平湖几里风香荷,荷花叶上露珠多。瓶罍收取供煮茗,山庄韵事真无过。惠山竹炉易得,山僧但识寒泉脉。泉生于地露生天,霄壤宁堪较功德。冬有雪水夏露珠,取之不尽仙浆映,越瓯吴羹聊浇书。匪彝炼玉烧丹炉,金茎汉武何乎!”

诗中透露,皇家园林的湖里栽种着大片莲荷,每天清晨,荷叶上露珠晶莹,于是便有宫监们将这些露水细心收集到瓷坛或银罐里,作为皇帝品茶时的专用水。这位皇帝很为自己的享受得意:就是隐居深山的高僧也只能品鉴到石间清泉而已,哪里比得朕夏秋用荷叶上的清露,冬天用洁雪烹茶?

乾隆一再于诗中吟赞荷露烹茶之美,可见此

举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这位当时世界上最具权势的伟大君主的日常享受。一条有趣的线索是,清代西溪山人所著《吴门画舫录》里提到,苏州的妓女徐友兰“以荷露烹茶,与生共话”,由之可知,采集荷叶上的露水以供品茗之需,是传统生活中广泛流行的一种风俗,上自皇帝下到妓女都懂得也喜欢享受这样一种夏季时令清味。

乾隆在另一首《荷露烹茶》的注文里阐发说,“水以轻为贵”,据他亲自反复测量,泉水中以玉泉山水最轻,此外相较于玉泉水更为轻质的,便是雪水和露水了。显然,露水作为大自然自动生成的“蒸馏液”,在蒸发然后重新凝结的过程中,滤掉了地下水或地面流水携带的矿物质、杂质、土尘,相对更为清澄。因此,古人看重露水,正与今日喜用经蒸馏而成的所谓“纯水”属于同一道理。

另外,在中医看来,附着在不同植物上的凝露会吸附该种植物的叶或花所涵的营养,“其性随物而变”,因而形成相应的保健功能。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便认为,“荷叶上露”有“明目、下水



孟晖 达斡尔族,作家,曾留学法国,著有《画堂春事》等,译有《西洋古董鉴赏》等书。



刘洪波 1966年生,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